

编号 0001001

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

中 央 档 案 馆
湖 北 省 档 案 馆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湖北党团组织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上报中央的文件材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省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中共湖北省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一九二七年

团湖北省委刘昌群、韩光汉给团中央、党中央的报告

- 对唐生智溃败前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负责人
指导工作的批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1)

中共湖北省委转发中央通知的紧急通知

- 关于停止亦农和湖北省委常委职权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17)

团湖北省委致中央湖北特委的报告

- 关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负责人指导工作的错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19)

团湖北省委全体会议决议案

- 建议处罚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33)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向省委扩大会的报告

- 在唐溃败前后，省委指导工作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36)

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批评长江局和省委工作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81)

林仲丹致中央湖北特委信

——反映省委阻挠讨论“八·七”会议决议案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85)

罗亦农向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的报告

——关于停止其巡视员职权的几点申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89)

中央湖北特委致中央信(一)

——报告亦农三点错误并附送有关材料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100)

附一：中共武昌市委决议

——对过去省委及长江局的批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02)

附二：中共汉阳县县委对于省委工作的批评及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 (108)

附三：中共汉口一、二、三区区委联席会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110)

附四：中共徐家棚区委致中央湖北特委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13)

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记录

——报告中央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对省委指导工作的
检查批评、选举新省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114)

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

——批评长江局和省委政策之错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164)

中央湖北特委致中央信（二）

——查办湖北省委及亦农同志经过情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 (167)

黄赤光给中央湖北特委并转中央的报告

——对鄂南暴动问题的申辩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174)

罗亦农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0）

育南给中央的信

——关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错误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199）

陈乔年、任旭、黄五一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对中央湖北特委查办省委常委和省委扩大会
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1）

一 九 二 八 年

关学参、张计储等给中央的报告

——对中央湖北特委成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言行的
批评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219）

陈乔年、任旭、黄五一对于湖北问题的总答辩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227）

团湖北省委刘昌群、韩光汉 给团中央、党中央的报告

——对唐生智溃败前后长江局及湖北
省委负责人指导工作的批评*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 ①

中央并转C.P.中央：

此次唐生智在鄂溃逃时，湖北党在工作中表现得异常恶劣退后，其主要原因，实由党之长江局负责人亦农同志及湖北省委在此次争斗之指导上，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爰将经过情形，报告如后：

(一) 暴动的决定

在十月下旬，武汉工人方面的失业争斗及一般

① 原件时间似有误，此时间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的经济争斗均异常紧张，同时唐生智在长江下游的战事一再失利，直到月底，唐军的败讯一再传来，军队不断由下游向武穴退却！十月二十二（？）晚，党的军委会到会林、陆、伍〔任〕、黄、刘诸同志（乔年尚告病假），大众意见认为当唐生智武汉溃退时，党应领导武汉工人举行暴动，并提出不与任何方面勾结作军事投机之原则。当经讨论，一致认定讨唐乃新军阀混战的开始，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观察，唐之倒台乃必然的事实，党应立即动员。在武汉工人方面，加紧经济争斗及赤色恐怖，由零碎的骚动一直到暴动，用群众的形式恢复并公开总工会及各工会，杀尽一切反革命派，并破坏反动机关，扩大苏维埃的宣传，准备在唐逃武汉、统治阶级混乱时，以群众暴动形式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在农村方面，加紧游击战争及劫夺溃军枪械的工作，发展零碎的斗争进而形成暴动，造成局部的割据，当推定任旭、泽楷、昌群三人起草暴动议决案，准备次日上午十时再开常委会议通过。次日党开常委会照草案略加修正并拟出口号二十余种。当时C.Y.并向党常委提出事先集中、补充、分配武装；组织宣传队；赶印并分配传单等问题，当被通过。同

时决定党团即开始召集各种会议，从事各方面之调遣与布置。

（二）长江局的指导

在唐生智由动摇而崩溃时，党应领导群众由骚动一直到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决定以后，党团工作即有相当的紧张的表现，C.Y.、C.P.省委在二十三、二十四几日内，召集了活动分子会、省委会及区、市、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等，各级同志精神，大都振作起来。但此时，长江局主任亦农同志即由湘回鄂，在二十六（？）^①参加省委常委会时，即指出省委此次暴动政策之决定，会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认为：（1）唐生智决不会马上倒台，将守鄂东武穴，至少亦将死守武汉，有背城借一的死战；（2）党在武汉的力量太薄弱，万不能在最近时期暴动；（3）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及准备不充分。此外亦农同志更指出省委决定之“暴动打倒唐生智”、“暴动恢复总工会”、“暴动杀尽工贼流氓”、“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决定为失当。党不能向群众甚至下层同志提出“暴动”口号。并分析省委决定“由零碎的骚动一

① 原文如此。

直到暴动”是不对的，认为暴动是要一下起来马上成功的！倘若有零碎的骚动，则能引起统治阶级注意，将我们的组织打碎，遂提出取消“暴动”的策略！做建立秘密工会，经济斗争，游击战争，夺取武装，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等工作，待将来到暴动时再一下爆发暴动，以期成功！于是省委常委会所决定的准备在唐〔生智〕倒时立即暴动之政策，因之取消，而决定“反军阀战争宣传周”，以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唐生智的倒台，已被认为“肯定不会就倒”的。所以唐倒时，党究竟应该干些甚么，更是“束置高阁”、“不必说起”了！当时C.Y.代表虽曾提出“党应坚决的决定在唐倒之时要领导群众起来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其他一切工作，均应照这总的策略为出发点，是充实这总的策略的各种工作”，但亦农同志的答复是“暴动不是开玩笑，不能随便决定的”，“现在应充分准备酝酿群众的革命高潮，然后才能说到暴动不暴动”，“现在是应长期的做准备工作，不应马上暴动”等话。

（三）C.Y. 长江局会议中亦农同志的报告和我们的意见

大学省委是已经取消了暴动的政策了，长江局的政治通告亦明显的指出现在不应马上暴动，而应做反军阀战争宣传周等所谓长期的做准备工作了。但C.Y.同志对长江局及省委取消暴动政策始终怀疑，始终认定党应有一决心在唐倒时领导群众起来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且此政权无论存在多久，都是必要的。故于十一月一日召集长江局及省委常委联席会，请亦农同志参加作政治报告并讨论，亦农报告大意：（1）革命潮流高涨低落；（2）暴动呢？不暴动呢？（3）不暴动干甚么呢？出路是甚么呢？说明两湖秋收暴动及广东贺、叶军队虽然失[败]，革命潮流仍是高涨；但现在的工作，不是暴动，因为唐生智的力量是不容易消灭！目前和鄂南暴动时不同，当时唐生智的统治还未稳定。现在是要用长时期的准备，“到暴动之路”，而且将来的暴动是一定要成功的！现在是不能暴动，但革命潮流向前发展，将来须要走到暴动前途的，以及不暴动的种种工作（见当日记录）。C.Y.同志即提出下列意见：（1）唐的稳定靠不住，在军阀间冲突这样剧烈，而将爆发不可遏止的军阀战争的时局，没有一个军阀的统治是能够稳定的；（2）唐生智的

倒台，在湖北是充实了“八·七”会议暴动政策的客观条件的一个重要时机，我们不应抛弃这个重要的时机，而没有一个坚决的暴动政策之决定；（3）现在武汉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没有出路，经济恐慌，失业痛苦，均已很快的到来，除出暴动夺取政权以外，没有其他出路。现在资本家闭厂停工的事情发生而且扩大，结果工人群众将流离失所，不复能有固定生活，不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党为了群众的需要，站在群众的领导地位，甚至为了使工人群众仍在党的领导之下，应该坚决的决定暴动的政策！但亦农同志总坚持他的意见，并说：“你们估计唐的倒台太容易”，目前不能马上暴动，若要暴动，就是“冒险主义”，现在是要充分准备，以一个月至三个月准备暴动，三个月至六个月开始暴动等。当天的讨论无结果而散！

（四）敌人跑了

党的省委在长江局指导之下，既深信唐生智不会就倒台，而停止暴动之“冒险”（？）^①的决定！自然没想到在唐倒时要做些甚么！于是在二十六日到九

^① 原文如此。

日的党，就是全埋头于讨论湖北工人决议案，准备从十一月十八日起开始作反新军阀战争宣传周等坐而论道、“诗云”、“子曰”之声的工作！唐的溃兵一天一天的后退，武汉各机关的职员都在开始做“送家眷”到租界等善后工作。九日C.Y.省委开会时，有党的书记乔年同志出席，C.Y.既提出唐倒已迫在眉睫党应准备在唐倒时的工作，如工会公开，经济罢工，群众的红色恐怖，杀工贼反动派，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等。乔年同志当答此工作自然要做，不成问题，但唐是否马上倒台，是否将在武汉死守，作背城借一之战的，我们不能确定。当日晚党在常委会提出“万一”唐倒时的工作，推定党书记、组织、军委及团军事负责人组织一特别委员会，准备军事工作，十日特别委员会召集区、市、县委书记联席会，报告“劫牢”、“施行红色恐怖”、“夺取溃兵枪械”等军事工作，但省委并未指出这次行动的目标，以及具体工作，并无动员的表示。

敌人（武汉各政府机关，改组委员等）在九日开始搬家，十日大搬，使租界交通为之断绝，十一日已搬完十之七、八了。他们自相告语，说唐倒东南军队来，武汉战争倒不至于有的，但C.P.则一

定在十号、十一号要暴动，对他们有一普遍的屠杀与惨[残]酷的报复，因此，他们就搬家得特别厉害，特别迅速。但那时C.P.省委尚在唐是否背城借一，是否马上倒台的考虑中，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与责任。十一号上午武昌市大学、中学市委开联席会，大学市委报告省特委十日所报告的军事工作后，遂讨论决定当晚劫牢等事，但当晚党对政治尚无一正确之认识，工作的目标还未讨论与决定，对下层党部，尚无一明确的指示（武昌大学市委虽已与中学很积极的共同讨论劫狱等事，但汉口C.Y.区委当日问C.P.区党委决定了甚么工作没有时，C.P.区委竟瞠目不知所对，说是没有听到甚么消息，没有接到甚么命令呢！）。C.Y.省委代表当日过江，方知道武昌要干，但不知是甚么时候的命令（十日会C.P.并未通知C.Y.省委参加），于是连忙率同武昌市委过江，立即开常委会，当时认为自党取消暴动策略后，一切关于准备暴动的工作都没有做，照目前情形暴动已不可能，是以我们对此行动的目标，应该是完全公开全武汉的工会，以群众的形式启封各级工会，及省总工会；以群众的红色恐怖，杀戮一切工贼、流氓、政府官吏，扩大苏维埃的宣传，使群众对政权有

更热烈的要求，有更深切一步的对苏维埃政权之认识，具体工作为：（1）由全省总工会下令贴布告，于十三日晨八时总同盟罢工；（2）省总各级工总代表即日与群众见面，公开宣传鼓动；（3）大、中学宣传队在十二日下午二时前一律出发公开演讲，宣传群众起来推翻统治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4）马上将枪械分配各工人区，用群众红色恐怖杀尽工贼、流氓；（5）总罢工后，各工人区立即召集群众大会，提出工人总要求；（6）如敌人力量已经脆弱到极点时，应鼓动群众入武昌城及汉口友益街捣破政府机关、反动工会，启封总工会及各级工会；（9）^①用群众的形式打破牢狱，放出囚犯。但当日C.Y.省委开会时，去找C.P.省委书记乔年同志参加，乔年同志正在家里团团转，说要找育南同志，但育南同志在总指挥处的地址他都记不得了！这地址曾由马峻山通知乔年，而乔年竟忘记了，以至延误了开紧急会议的时间三小时之久！次日C.P.常委会讨论工作时，C.Y.省委代表提出意见后，经大众补充通过，并决十三日晨八时武汉总同盟罢工；十三日下午二时召集群众占据友益街，启封总工会。在武昌集中罢工工

① “(9)”似为“(7)”之误。

人于武胜门，杀工贼，打纺总改委会，城内劫狱等工作。于是根据这原则，分配常〔委〕亲赴各地指挥，但汪泽凯同志当日(十二日)到武昌时，已三时(武昌开会是一时)，当时已决定罢工，群众冲进街内，杀反动派，捣毁反动工会、政府机关，劫牢等工作。泽凯同志却很慌张的说“靠不住吧？太冒险了吧？”经会场同志解释辩论直至四时多方散会。但是，时间已迟了。等我们的枪械拿出城去的时候，工人已经上工，工厂已经关门，门内已经被武装的流氓把持住了(当时武胜门尚有武装流氓多人在各工厂门口看守，故决定带枪进厂，先将流氓打死，马上罢工)。当晚泽凯同志在城内总指挥处时，差不多吓得几乎手足发抖！说：“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吧？为什么来的人这样多呢？应该迁一个地方才好吧？”次日(十四日)，武胜门决定继续罢工和劫牢等工作。但省委以为军事工作须军部人指挥，故派一个“广东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农军队长、很懂军事工作”的大帽子介绍语的总指挥刘力劳到武昌去。但当晚我们的枪械带进厂，厂外又埋伏了特务队，七时，厂里同志开二枪打死工贼一人，打伤一人，全厂完全罢工，工人群众正待外面响应，便拥出工厂外面来时，这位总指挥却全身战〔颤〕抖，把